

葛壯。《宗教和近代上海社會的變遷》。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99。410頁。

Ge, Zhuang. *Religion and the Societal Changes of Modern Shanghai*. Shanghai: Shanghai Book Shop, 1999. 410pp.

近年中國大陸陸續出版了不少地方性的宗教史的著述，上海作為全國最大的城市，也是1949年以前全國多數宗教的中心，自然是必須首加關注的。上海擁有一支堅實的宗教研究隊伍，從各大學的基督教研究中心及個別學者，到上海社會科學院、上海市宗教學會等，在在都顯出他們在研究地方宗教史方面的魄力，他們的成就也令人刮目相看。

葛壯的《宗教和近代上海社會的變遷》，可說是繼阮仁澤等編的《上海宗教史》後，另一本值得注意的著作。事實上，兩本書之間也有繼襲的因緣。據葛壯在本書〈後記〉說，他是在八十年代末期參與《上海宗教史》的撰寫時，對宗教與上海社會變遷的有關課題產生興趣，並與張樂天、孫立等於1991年組成課題組，在中華基金會的資助下開展研究，及後因人事變遷，只剩下他一人獨力完成是項計劃。從此我們也可知道，本書旨在探討宗教與近代上海社會變遷的相互關係，至於宗教的內部發展，特別是教義、禮儀與組織，則不是其關懷所在。

事實上，過去已有不少學者處理過宗教與社會間的關係此課題。以基督教為例，顧長聲、顧衛民、姚民權等都是其中卓爾有成的代表。本書作者也參用了他們大量成果。與這些已出版的成果比較，本書的特色是將研究範圍集中在上海一地，但並非集中在基督宗教，而是涉及佛教、道教、伊斯蘭教、天主教、更正教、東正教、猶太教等，連錫克教也略有提及，只是涉及的不多。不過，就在這一點上，顯出本書其中一個缺點：雖然其討論對象是廣泛的各宗教而非集中某一宗教，但處理手法仍是將各宗教分章或分段獨立處理，沒有作甚麼參對比較（天主教與更正教之間偶然有一、兩句），故僅能為我們提供一本便於翻閱的合集，而沒有描繪出近代上海宗教發展的整體面貌。

本書分三部、十二章，上編五章主要分述各宗教在上海的發源，及其引進的各項文化與社會服務設施；中編四章則探討近代政治社會轉變對幾個大宗教發展的影響；下編三章縷述上海宗教的一些特徵，包括人物、建置與社會生態。從結構上說，布置可謂全面貼題。由於處理對象的幅員太大，資料分布不均，故各宗教間的詳略不一，闡述手法也不相等。上編與中編以論述天主教與更正教為主，佛教與伊斯蘭教只能佔有限篇幅，其他規模較小的宗教更只能放

在下編。並且，本書原擬處理宗教與社會變遷的相互關係，但宗教對社會變遷的影響方面，在天主教與更正教才較顯著；佛、道、回教便較集中在社會變遷對宗教的影響；其他宗教，多只能縷述其「在上海社會」的發展史了。不過，這是同一本書處理多個課題時所難以避免的資料限制，不能以此責備作者。筆者只是重提前述的話，若作者能就各宗教如何整體地影響上海社會的發展，則這些詳略不均的單元便更能發揮它們揭示歷史面貌的作用了。

在所討論的具體課題方面，本書較為平鋪直敘，主要分述宗教的各項社會建置、宗教徒的社會參與、宗教與社會的迎拒衝突等；有關宗教文化與社會的相互形塑，書中以西洋宗教如何形塑中國社會的部分對論得較多，至於中國社會如何形塑東西方宗教的部分則幾乎闕如，而在表面現象背後，作者涉及的社會分層、社會組織與深層心態的篇幅也甚少。譬如他指出了教會學校學生逐漸變成由社會上層子弟佔主流的事實，卻沒有詳及教會教育如何影響不同階層的社會流動與遷徙；他敘述了傳教士在上海開辦的印書館與出版事業，及其引進西洋知識的作用，卻沒有進一步討論這些西學知識如何在上海社會產生作用。

資料方面，本書從注釋臚列的書目看，幾乎僅限參考近人著述，原始資料乏善足陳，即或偶爾提到《萬國公報》、《申報》等原始資料，就其所引的形式與數量言，大抵也是轉引而沒註明的居多，真正自行翻爬出來的可能性甚低。這是較為令人可惜的。不過由於作者在上海市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工作多年，又曾參與《上海宗教史》的撰述，他對上海市宗教的地理掌故，了解頗為嫻熟；而作者曾專研上海伊斯蘭教，也為他在縷述這個環節時提供許多內行的資料。這兩點優點是必須肯定的。筆者略感遺憾的是，也許是基於資料及「既定觀點」的限制，作者仍未能突破論述對象較為隨意的常見現象。因此在二十至四十年代上海青年會的部分，劉良模的出現率，竟遠較歷屆總幹事為高；至若所謂「基督教知名人士」的吳耀宗，成了此時期的代表人物，就更不在話下。在基督教會方面，我們只能從中看到宋耀如和江長川的詳細言行，至於伯特利會、倪柝聲與地方教會、趙世光與靈糧堂運動等名字以外的具體內容，則不用期望可以看到。

要是本書的內容與資料沒有為讀者帶來太多驚喜，作者對史事的評述觀點倒是值得注目的。與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相較，作者對外來宗教的評價是更為開放與全面的，甚至較熊月之還要更前越。他直率地指出：建國以來，國內學者對傳教士在西學傳播上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及評價，總是以負面為主，鮮能正面肯定他們的積極作用。「多年來，這種頗顯牽強的論斷之所以會充斥學界論壇，根源還是人們長期形成的慣性思維在作祟，從不喜歡這些身穿黑道袍

的傳教士們的佈道職業，到傳統文化心理上對基督教、天主教這種『洋教』的排拒，都使他們不願也不敢從客觀上給外國傳教士一個實事求是的說法。至於後者在影響極其深遠的西學東漸中所作出的許多貢獻與創造，也只能是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了。」(頁50～51)。在談到傳教士引入西洋社會風俗習慣時，作者也不純粹從文化侵略的角度入手，卻指出：「從上海教會方面吹出的陣陣『西風』，雖帶有強制性的文化滲透性質，也會讓國人產生不舒服的感覺，但許多閃爍著近現代人類社會文明智慧光輝的精華，也都啟迪了華夏學子的心扉，激發他們創造出屬於自己民族的近代先進文化。」(頁302)從這些評論，我們可以看到新一代國內學人的思想風貌。

梁家麟  
建道神學院